

何 遲 文 集

①

百花文艺出版社



何迟文集

①

百花文艺出版社



摄于 1980 年

报幕人 谢经理 ^(观众情绪太热烈了) 你就再唱出一百五十元叫他唱一首吧！

谢经理 (从手提办公箱内拿出一沓一百元的票子和一张五十元的票子，对吴伯逊说) 在这儿簽个字。(吴伯逊簽字后，谢把錢给了他) 又叫你讹走了一百五十块钱！

吴伯逊 (笑了笑) 不是讹，我这是按劳取酬。(从西服裤左腿臀部位置的口袋里取出一个钱包来，把一百五十元熟练的放进钱包，把钱包又放回口袋迅速的扣好口袋盖上的扣子，对报幕人说) 请你上台报幕吧！

报幕人 (登场站在舞台左侧的扩音器前。) 观众同志们，现在我们请吴伯逊同

出版说明

《何迟文集》辑了作者自1940年至1983年为止的创作生活中的部分作品，按相声、笑话、剧本、诗歌、杂文、文艺理论、回忆录等体裁和著作年代编次。

文集共分为两卷，其内容为：

上卷：相声、笑话、剧本

下卷：诗歌、杂文、文艺理论、回忆录及其他。

文集的作品都基本保持原作初版的面貌，此次收入仅作了错别字的订正。收入文集前未曾发表过作品，我们在编辑时略作了些修改。因作者的许多作品均已散失，肯定会有不少遗漏和缺点，希望读者和研究者指正。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年7月

走过的脚印

——自序

我是一九二〇年阴历七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满族。原名赫裕昆，字柏岗。参加革命后改名赫赤，后又更名何迟。无笔名。

我父亲名叫赫春林，字杏邨。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考中了秀才，又考中拔贡。辛亥革命后就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他一生最高的职位，只做过小学校长。因此，我的家庭成分是自由职业者。

我在四岁时，由父母教识字。六岁到七岁，上过小学一二年级。因为我父亲觉得小学的课程太浅，就叫我跟一位名叫唐鹤卿老先生附馆读书。我曾先后跟随他在几个阔人家陪同他们的少爷和小姐念书。我第一本读的是《龙纹鞭影》，以后又读了《弟子规》、《幼学琼林》、《论语》、《孟子》、《古文观止》、《论说精华》和一些骈体文。

到了十一岁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在郑州私立第一小学校当校长，我就随他到郑州，在他任职的学校里，插班读四年级。我父亲虽然是个老拔贡，但是却十分喜爱艺术。他自己曾亲自给学生导演过《兰芝与仲卿》，并且亲自上演过《洋状元》等话

剧。此外，他还领着我看了不少京戏、电影、杂技、歌舞；并且亲自写快板叫我表演；亲自编相声如《对对联》、《猜灯谜》等，叫我演出，培养我敢于登台表演和讲话的勇气。因为我把精力大部分放在看戏、看电影、听评书、听相声方面，以致荒废了学业，因此，在小学六年级留了级。我的功课只有语文和算术考在“甲上”，其他功课大部分都在“丙”、“丁”之列。小学毕业后，我上了郑州市内原名“东里书院”的明新中学。在这所中学求学的时候，我每天只上半天课，下半年几乎都逃学去听评书和看电影去了。明新中学的校长也是一位老拔贡，他经常邀请一些所谓名流到学校里讲演《大学》、《中庸》等。我对这些讲演和所学的课程，除语文外，都不感兴趣，但对于学生们自己组织的业余演出却是每次都参加的。我曾演出过默剧《摩登理发馆》、《大骗和小骗》等闹剧节目。

一九三四年我父亲得了脑充血的病，虽经抢救治愈，但健康条件却使他不能继续工作了。于是在一九三五年我随父亲又回到了北京。当年我考上了私立镜湖中学，学校纪律十分松弛，只要按期交学费，就可以在毕业时得到文凭。因此，我仍然是在学校只读半天书，下午则逃学去听相声、看电影。由于我的记忆力很强，居然听会了几十段传统相声。当时所演的电影，我很喜欢劳莱和哈代的《从军乐》以及陆克、卓别林的喜剧片。但更喜欢的却是飞来伯主演的《月宫盗宝》、《黑海盜》之类的影片。虽然也看过电影《复活》，但当时却完全不理解这部影片的深刻含义。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也参加了罢课和游行。

我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父亲的薪金生活。在他失业之后，只好靠变卖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来维持生活。同时，

我父亲预感到北京市迟早要落到日本侵略者手里，所以就为我
想各种办法，谋求生活之路。当年我曾去应考过电话接线生、
邮差，但都因为没有“门子”而不能考取。后来，陇海铁路在
北京招考客车招待生，在香山慈幼院考试，我却被录取了。于
是我又回到了郑州，在陇海铁路客车招待生训练班学习铁路知
识。班里有六十多人，有大学生、高中毕业生，也有初中毕业
生。由于管理严格，只许星期日外出，这样，我在这里学习就
比较用功一些，每月考都在前七八名。当年发生了西安事变，
由于我在一二九运动时懂得了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蒋
介石是推行不抵抗主义政策的，所以很盼望张学良能把蒋介
石杀掉，以便早日除去抗日的障碍。后来知道这个想法是错
误的。

在训练班学习时，路局规定我们每个人的伙食费是六元，
而我们每月吃的伙食却非常坏，只能吃到三元钱的东西。一半
伙食钱，都被大师傅和管理员合伙贪污了。为了争取应有的福
利，保证同学们的健康，在几位曾经受过共产党影响较深的同
学号召下，发动了绝食斗争，最后，把伙食管理的领导权，从
管理员手中夺了过来，由学生们组织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接管
伙食管理工作，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带有革命性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我接到家中电报，父亲逝世了。我从郑州奔丧
回京，安葬了父亲以后，七月六日我离开了北京回郑州，到郑
州才得到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从此和家庭失去了联系。

芦沟桥事变后，招待生训练班结业。我们这伙人就被分配
在陇海铁路的蓝钢皮客车上工作了。客车招待生的老名字叫
“看车夫”——实际上就是在火车上的清洁工人兼伺候人的。
在车上做的工作，就是扫地、擦地板、擦玻璃、冲洗厕所、清

除垃圾之类的零活。

客车招待生训练班一共办了两期，共一百二十人左右。芦沟桥事变给了我们很大的震动，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都有抗日的要求，但却不知道做些什么好。一部分青年却由于吃喝嫖赌，堕落成为烟土贩或走私分子。其中的大部分人则抱过一天混一天的思想，彷徨苦闷，没有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客车招待生中建立了支部。在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救亡团体，如：车上服务团、怒吼歌咏队、益群读书会等。我在党支部指引下，参加了救亡活动，成为车上服务团的骨干分子，并被选为宣传股长。我们曾到各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进行慰问活动。还在一个大城门洞里出版了大幅的墙报。我是这个墙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在怒吼歌咏队里我也学会了《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热血》、《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数十种之多。

在党支部的指导下，我读了《大众哲学》、《抗大动态》，以及鲁迅先生的小说《彷徨》、《呐喊》等。我们用募捐得来的款项，出版了铅印的刊物《陇海铁工》，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我写的《告陇海铁路工人书》。记得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黄河岸上，他们的炮弹已经隔河打到了潼关车站，陇海铁路已经被日本占去了一半，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工人应该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游击战！……

在文章里还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在陇海铁路裁工人、养老爷的错误措施。由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被叫到陇海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受到了极其严厉的训斥。

同年，丁玲同志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演出。我参观了他们的宿舍，看了他们的演出，读了他们的出版物，这对我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一九三八年初秋，我被党组织保送到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同行者还有五六位同志，在出发的头一天，我们在夜间秘密地到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报到，第二天就出发了。先步行八百里地到甘肃庆阳的抗大二分校，在这里学习了一个多月之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不断进行挑衅，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于是，我又随抗大二分校步行八百里到了延安。

在延安时，先是在清凉山二大队学习，不久转入工人大队。由于党中央决定成立工人学校，我又转到工人学校去学习。工人学校是半党校性质，兼课的教员都是中央党校的。在这里我学习了《社会科学概论》、《辩证唯物论》、《论持久战》等课程，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上山开荒，种玉米和土豆。同时，在工人学校里我参加了工校的业余剧团。演出了《矿山》、《弟兄们拉起手来》、《红灯》、《油布》、《窑黑子》等话剧。在中央大礼堂，听到了冼星海同志亲自指挥的《黄河大合唱》。于是，我对戏剧艺术加深了认识，更提高了兴趣。

一九三九年六月，党中央决定从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各抽出一部分干部和学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到晋察冀边区去学习和工作。出发前，毛主席亲自到工人学校给我们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话，赠送给我们三件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在党的生日这一天，华北联合大学全体人员出发，奔赴晋察冀边区。一路上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突破敌人的一层层封锁线，行军三个月，于一九三九

年十一月初，到达了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城南庄。由于我在三千里行军过程中，常常以文艺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华北联合大学工部毕业后，一九四〇年被分配到华北联大文工团工作。从此就成了专业文艺工作者。

在联大文工团，我主要担任演员、编剧和舞台管理（即舞台监督）等工作。在这一时期，我曾写过话剧：《我还是我》、《二大伯》（为配合誓约运动而写的）、《两个包袱》（为在政治攻势中争取伪军反正而写的）等十余种；我演出的话剧有：《回到祖国怀抱》（饰伪军官）、《钦差大臣》（饰波布钦斯基）等十几种；还演出过京剧：《陆文龙》（饰陆文龙）、《失空斩》（饰司马懿及老军）等数种；此外，还写过相声戏：《喜讯》（为讽刺在敌人“扫荡”中投敌叛变分子而写的）、《二五减租》等五六种，这些相声我曾亲自登台演出。《喜讯》曾得创作奖。

经过一九四〇年秋季反“扫荡”和一九四一年反“扫荡”，以及在敌人“爱护村”里进行工作和政治攻势的考验，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经支部通过，上级批准我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四三年初，联大文工团一部分同志并入抗敌剧社，于是我便到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工作了。直到京津解放之前，我才被调离抗敌剧社。在这几年里，我仍然担任演员、编剧和舞台管理等工作，也导演过一些戏。

这时期我演过的戏有《侵略》（饰德国军官）、《俄罗斯人》、《戒冠秀》（饰二大伯）、《英雄儿女》（饰老汉）、《群妖》（饰国民党政客）、《王老栓报仇》（饰二阎王）、《栽树》（饰种树老汉）、《子弟兵、老百姓》（饰民兵）等话剧、秧歌剧、河北梆子等约三十余种。

我写的戏有《双打赌》、《大庆功》(集体创作, 由我执笔)、《姐妹顶嘴》、《欢迎新战士》(上述二剧是由我和胡可同志、韩塞同志三人合写的)、《眼睛亮了》、《赶路相遇》、《暴骨》(“暴骨”二字是冀中安国县流行的地区方言, 意思是把贫苦农民财产全交给地主来抵债。当地土话叫做“暴骨还帐”)、《别敲鼓》(在安国搞土改时, 为了宣传党在土改运动中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使市镇的工商业者心里别敲小鼓, 解除思想顾虑, 努力搞好经营)、《全家斗》(描写地主在土改时隐瞒财产、幻想变天、妄图诱骗个别农民替他们当“防空洞”, 结果这个农民提高了觉悟, 擦亮了眼睛, 全家奋起向地主展开斗争的故事)、《新年秧歌队》(包括《大拜年》、《小拜年》、《推小车》、《打老蒋》、《爷俩赶集》等七个节目), 大约三十余种。其中除《暴骨》外, 都是喜剧。

此外, 还写了相声:《买毛驴》(描述国民党军队骚扰老百姓, 抢去毛驴, 同时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 三条毛驴驮的中央币还买不了一条毛驴, 来揭露当时国统区民不聊生的现实)、《纪念周》(通过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磨擦倾轧, 侧面地揭示他们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 勾心斗角的丑态), 以及《某甲乙》(为配合整风运动而写的)等数种。

鼓词有《双十纲领》、《复仇》、《十女夸夫》、《八路军力量多么大》等五六种。

我曾经导演过的戏有《血泪仇》(河北梆子)、《李大娘送子归队》(歌舞剧)、《喜相逢》(喜剧)、《两个包袱》(喜剧)、《全家斗》(歌舞剧)等十余种。

在战争年代里, 由于物质条件十分艰苦, 我写的作品, 除《复仇》、《眼睛亮了》、《赶路相遇》曾由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铅印

成书外，其他都是为了演出而印的油印本。

在抗敌剧社时期，曾经历过一九四三年的反“扫荡”，一九四四年在平汉铁路清风店附近进行政治攻势，平西根据地的护粮斗争，大生产运动和安国县的土改运动。一九四五年张家口解放后，曾参加过戏曲、曲艺的改革工作，取得了戏曲改革的一点点经验。

一九四八年底，我被华北局调离抗敌剧社，到胜芳镇（在天津西部）进行解放天津市以后的接管准备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当日我们从胜芳镇出发，急行军进入天津市内。

进城后，我曾先后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代表、第三宣传队副队长、文艺处戏曲科科长、群众剧团副团长、天津市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天津市影剧场公司经理、天津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戏曲学校校长、南开大学中国语文系兼职教授等职。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中国曲艺研究会理事。此外，还被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九五〇年曾担任中华杂技团导演，在国外工作半年。

在这个时期，我的艺术活动有以下几项：

一、创作了《仁义北霸天》（京剧）、《乌鸦告状》（评戏）。改编了《蝴蝶杯》、《刘伶醉酒》、《王二姐思夫》、《杜十娘》等戏曲多种。其中《杜十娘》由吴同宾同志导演、鲜灵霞同志主演，至今成为天津市评剧院的保留节目，在天津市第一次戏曲会演中得剧作奖。

二、论文有：《谈〈一贯道〉在天津的演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是怎样导演歌剧〈奥涅金〉的》、《史楚金是怎样演列宁的》、《从〈新事新办〉谈到曲剧的发展》、《论我国杂技艺

术》、《论舞台艺术的真实感》以及剧评多种。

三、相声有：《今晚七点钟开始》（讽刺说空话、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践的不良作风）、《开会迷》（讽刺繁冗的令人疲惫的会议）、《买猴儿》、（讽刺官僚主义作风）、《调查表》（批评繁琐的文牍主义作风）。其中，《买猴儿》被译为英文、俄文，影响较大，获奖。

四、电影有：导演过《中国杂技艺术表演》（纪录片）、写过《马大哈进北京》（已发表）及《不拘小节的人》等。

五、曲艺方面的活动有：主编过陈士和先生的评书《聊斋志异》十四种；整理过张寿臣先生的《单口相声集》。

上述所有的作品，分别发表于《人民戏剧》、《人民文学》、《天津日报》、《蜜蜂》、《曲艺》、《长春日报》、《评剧丛刊》等报刊杂志上。有些剧本如《杜十娘》、《仁义北霸天》、《白蛇传》曾出过单行本。

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在这十五六年当中，我在艺术实践上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是以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来表现我国人民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创作道路。在我所写的相声当中，有着比较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九五七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一九六一年九月三十日，文化局党委对我当面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调天津市戏曲研究室当研究员，允许我继续进行写作。国庆节那一天，我从早到晚，用了一天时间整理图书资料，收拾出一间勉强可以进行写作的小房子。自十月二日起，我开始动笔重新投入了写作工作。到一九六三年五月之前，在这一年零八个月当中，我创作了大型戏曲《碎玉记》（京

戏，大悲剧)、《三喜图》(京戏、喜剧)《范玉鸾》(评戏，写解放战争中一个妇女会主任向地主还乡团进行斗争而牺牲自己的故事)。重新改编了《蝴蝶杯》。创作了独幕话剧《有情人未成眷属》(喜剧)、《狄克的生日》(正剧，描写黑人的痛苦生活，和他们向种族主义者作斗争的故事)。创作了相声四种：《打虎论》(这是一段全面批判赫鲁晓夫主义的哲学相声)、《背课文》(儿童相声)、《高人一头的人》(讽刺了一个自高自大、处处想压倒别人的人)、《打喷嚏》(取材契诃夫小说《一个小公务员之死》)。此外，还写了《论蝴蝶杯》、《戏曲艺术的特点和新戏曲的创造》，以及其他小论文二十几种。

由于我废寝忘食的进行写作，突然得了十二指肠后壁穿孔的重病，不得不进行手术治疗了。在我国泌尿科专家虞颂庭同志和急腹症专家吴咸中同志精心治疗下，很快伤口就愈合了。这是吴咸中大夫给我做的第二次大手术(远在一九五三年我患胆结石症，那次手术也是吴咸中同志亲自给我做的)。所以说，我的消化系统，已经进行了两次“结构改革”，我能够活到现在，是要感谢虞颂庭和吴咸中大夫的。

我虽然写出了这么多的作品，但只发表了两段相声和几篇小艺术论文。于是，在我健康稍加恢复之后，就向党组织提出了参加“四清”的要求。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我一连参加了三次“四清”运动。我在“四清”中所写的四十万字左右的村史、家史材料以及我在“摘帽”以后所写的全部作品，都在十年浩劫当中被送进造纸厂当做造纸原料了！

一九六六年“四清”转入“文化大革命”，我被扣上了“大右派”、“封建余孽”、“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毒草专家”等七顶帽子，并被关

入牛棚，不仅深刻地“触及”了我的灵魂，而且有力地触及了我的肉体。以后，又被送进“干校”去“学习”。在种种沉重的压力下，我只得一次接一次连续地“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受到严重地折磨。最后，从一九七〇年起，完全瘫痪在床，只要眼观异物，耳听异声，就全身痉挛，而且不能翻身侧卧，完全失去了自理生活的能力。就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我活下去的思想，仍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为了恢复体质功能，继续为党工作，我便天天在床上做些肢体活动的锻炼。但是一些令人悲恸的消息不断袭来，我为敬爱的周总理和几位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逝世而痛哭。

深秋季节，传来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之后，我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很快地构思了一段《“四人帮”末日记》的相声。以后，又在病床上写了一些新诗和旧体诗，并把我在住牛棚时期和住地震棚时期的对“四人帮”的腹诽之作，默写了出来，自己编了一个小册子，名叫《牛棚诗抄》。我曾在那寒风凛冽的日子里默默在心里占诵过这样的诗句：

绝非世无才，乾坤颠倒来。

狐兔飞天际，鸾凤落尘埃。

老师冤沉海，鬼魅笑登台。

何当风雷动，重新再安排！

这样的诗句，若是形成文字，在当时被“四人帮”发现，则衰朽之躯，恐怕是难以幸免的！

在一九七九年元月里（即阴历除夕那天），天津市一位负责同志，到医院去看我，当面宣布对我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予以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原职、原薪。当

时，我内心深处迸发了蓄积很久的一句话：党啊！您的儿子终于又回到您的怀抱里来了！同时，下定决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这一天，我激动地在病床上又写成一首诗：

欣逢盛世锁眉扬，身欲奋飞病在床。

老马嘶风为呐喊，衰牛犁土不彷徨。

推敲好句歌红日，结构乱弹战黑帮。

荡垢涤尘喜展望，阳光普照耀八荒。

但是，在写完这首诗后，仅仅几天，不幸右臂骨在医院折成三截，这样，我又丧失了执笔写作的能力，只留下了一个脑子和一张嘴为党工作了。七九年四月出院后，到现在已经四年半了。在这期间，在天津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党委、文联党委的关怀支持下，在天津市曲艺团党支部、天津市戏曲研究室党支部的具体帮助下，利用我口述，由别人记录的方式，写了几十首旧体诗、六段相声发表，还写了杂文二十余种（均已发表）、《革命回忆录》四题、话剧（《爱情的闹剧》）、问答体的相声艺术论文及《舞台艺术真实感》等。总计共约三十多万字。

一九七九年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常务理事。一九八〇年在天津市第四次文代大会上被选为文联副主席，并被市政协特约为天津市第六届政协委员。一九八三年获天津市鲁迅文艺奖。

现在在市委宣传部关心下，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天津文学研究所的支持下，我的作品选集即将出版了。由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所写的作品，绝大部分都遗失了；由